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



现代汉语

何世达 编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

现代汉语

增订本

何世达 主编

吴为章 苏培成 郭明玖 何世达 编写
柴世森 季泽昆 黄汉生 张炼强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

何世达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11千字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0册

统一书号：9209·56 定价：2.35元

编写说明

本书是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组织编写的十八门课程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习题集等共三十三种配套的教学用书之一。

编写高水平的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特别是保证函授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几年来我们为此一直进行不懈努力，先后组织了许多有经验的教授、讲师进行编写工作。这套教材在今年配套出版前都曾在内部试用(有的已公开出版过)。在这个过程中征求了许多学员及同行专家的意见。为了使这套教材的质量更提高一步，更适合成人教育的特点，校务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在北京专门召集了教材编写会议，邀请了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有经验的教授、讲师统一思想、通力协作。落实了修改和编写的任务后，又用了近一年时间的补充修改，才交付出版。

这套教材力求适合成人特点，突出实用性与通俗性，多数基础课程作到教科书、教学辅导参考书及习题集系统配套，以便于学员自学。

编写具有成人特点的专业教材，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尽管全体编写人员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缺乏从事成人教育的经验，缺点仍在所难免。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学员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我们今后继续修改，

使这套教材更加完善，为发展我国的成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
一九八六年一月

绪 论

一 语 言

(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生活在社会里，人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别人，或者有什么问题要同别人商量，这就必须说话。说话，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就是说话者用嘴发出一连串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听，就是听话者从对方发出的声音里了解对方的思想。说话可以沟通彼此的思想，达到相互了解。说话这一活动，也就是运用语言。语言是交际的重要工具。

说话又是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重要特征。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林黛玉有一只鹦鹉，它会说：“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还会念《葬花词》里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能不能证明别的动物也会说话呢？吕叔湘先生说：“鹦鹉能学人说话，可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变。”^①因此可以说，别的动物都不会说话，没有语言，只有人类会说话，有语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交际工具。

人类的交际工具，除了有声的自然语言以外，还有以别的声音为物质材料的人工语言。比如戈麦拉岛上用的口哨语，

^① 吕叔湘《语文常谈》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就是用别的声音码化的“希尔伯”语（一种西班牙方言变体）。戈麦拉是加那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当地居民日常会话通常用西班牙语。但是，由于戈麦拉是一个环形岛屿，中部为山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两个人互相能看得见，要走到一起说话，常常要花许多时间。这样，从交际需要出发，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口哨为表达形式的语言，即“希尔伯”口哨语。一名好的哨手，能同5英里外的人交谈。这种“希尔伯”语，就是运用哨音表达自然语言的一种人工语言。此外，人类还用旗语、电报代码、数学公式、化学符号等等来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也可以用图画、手势、击鼓、烽火、红绿灯等等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但是，上述这些远不能与有声的自然语言相提并论。它们有的很简单，传达信息的能力极其有限，有的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只有有声的自然语言才能独自承担得起人类的交际工具，所以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

（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作为人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词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只有通过语言，思维的活动成果才能最完美地表达出来。那么，应该怎样来认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呢？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②。语言和思维是在人类劳动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彼此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① 《列宁全集》第二〇卷第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5页。

思维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这可以由科学试验得到证明。1980年，美国密苏里安大学的科学家开始阅读脑电波思维形式，并把它译成词语。科学家们把脑电图机的电极连接在被试者的头部，当被试者重复说出一个词时，就产生特定的脑波型。其后，被试者一想到这个词，就出现这个特定的脑波型。因此，根据脑波型，科学家可以辨认词，从而阅读人的思维。上述科学试验证明，人类是借助语言来进行思考的。

七十年代以后，“人工智能”的新学科大大发展，“电脑”不仅能够下棋、作曲、阅读文件、查检资料，而且能够从事一些简单的翻译工作。于是，有人认为，机器也能够思维，思维可以离开语言。不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学者认为，机器不能思维，机器不能输出任何未经输入的信息。如果说机器有思维的话，那也离不开人类的思维。

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思维。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物，因此，只有表达一定的思维活动成果的声音，才称得上是语言。巴甫洛夫说过：“词无论过去或现在，依然只是现实的第二信号罢了”^①。第二信号系统，只有人类才具有。词能够成为“现实的第二信号”，就因为它是语言的组成材料，而语言是与人类的思维直接联系的。

语言和思维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又不是同一种现象。这表现为：

1. 语言与思维的本质不同。语言是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2. 语言与思维的职能不同。思维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

^① 转引自捷普洛夫《心理学》133页，东北教育出版社，1953。

规律，而语言则把这些规律表达出来，使它们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

3. 思维是全人类的，语言是民族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语言也是全人类的，那么，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就应该相同。事实上，各民族的语言并不相同。

(三)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人类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 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

首先，社会的变动，对语言的影响很明显。比如解放以后，随着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厨子、看护、老妈子”等名称改为“炊事员、护士、保姆”，“车夫”则根据实际情况称为“司机、三轮车工人”等。这类情况说明，语言的产生、发展是同社会分不开的。

其次，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我国南北朝时期，鲜卑族人以鲜卑语为“国语”。到魏孝文帝时，“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当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鲜卑族人习用汉语之后，鲜卑语就逐渐消亡了。可见，离开了使用语言的人们，离开了社会的交际活动，语言也是不能生存的。

第三，在运用中，语言虽然表现为个人的语言活动，但是它仍然要受社会的制约，不可能成为个人武断的符号。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至今传为笑谈，而鹿还是鹿、马还是马，并不因为赵高的权势而改变。

2.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工具。人类从类人猿分化出来的那一天起，就

依靠语言组织着社会的生产，发展着社会生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我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有声语言，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语言的“变乱”势必引起劳动协作的破坏、社会集团的分裂，却是可以想见的。

3. 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些一般的社会现象相比，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是上层建筑，它同上层建筑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每一个经济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一定的上层建筑随着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产生、变化、消亡。语言却不同。拿我国社会和汉语来说，近百年来，我国的社会制度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几经变革，但不管怎么样，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第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一旦出现，就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进一步形成和巩固，并且反对所有阻碍自己的基础发展和巩固的阶级或力量。语言却不同，它不是由某个经济基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中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创造，并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

第三，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经济基础改变之后。语言却不同，它与人的生产行为和一切活动直接联系，因此，它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立刻发生的，而不等待基础的改变。同上层建筑相比，语言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复杂得多。

第四，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

的产物，因此它的生命是不长久的。语言却不同，它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它的生命比任何一个经济基础、任何一个上层建筑都长久得无比。

(四) 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个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服务，为社会各阶级服务。”^①

但是，并非人人都这么认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著名语言学家马尔错误地引用了列宁关于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认为同文化一样，语言也有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语言也是有阶级性的，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在我国，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有人引用民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说明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其实，这首民歌中提到的“话”，指的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思想当然是有阶级性的，但思想并不就是语言。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工具”怎么能有阶级性呢？这是把语言同思想混为一谈了。

语言作为一个社会内部的人们用以交际的工具，它没有阶级性，它具有全民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说话——使用语言和所说出来的话却是个人的。这又该怎么看呢？语言学界把个人使用语言的具体活动称为“言语活动”，把个人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503页。

说出来的话称为“言语”。“言语活动”“言语”有没有阶级性呢？每个人说话，在口音、遣词造句方面，总会有一定的特点。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开口就是“之、乎、者、也、哉”，这就是言语的个人因素。这些东西，用得适度，可以反映使用语言的某些个人风格；但是，用多了就会影响交际。因此，言语的个人因素要受到社会交际的制约，不可能占优势。至于个人独特的口音、违反全民语言规律的遣词造句等，这些则是非语言的因素，更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可以这样说，个人的言语活动，必须使用全民的语言，个人说出来的话，即言语，也必然是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形成，所以，无论是语言，还是言语活动、言语，都是没有阶级性的。

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是社会各阶级对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我们说人类社会不存在一种只供一个阶级使用、只为一个阶级服务的“阶级语言”，并不排除各个阶级（或阶层）都尽量把阶级（阶层）本身的意识、爱好、偏见、情趣、习惯……塞进全民共同的语言中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样，就有一些黑话、雅言和特殊的行业语被某些集团的人们创造出来。比如，我国旧社会的走私贩把数字变成密语：“一”叫做“旦底”，“二”叫做“挖工”等等。

但是，上述情况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语言的全民性。因为：第一，这种词语，数量很少，使用范围有限；第二，这种词语，不能独立，必须在全民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斯大林在批评马尔时明确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

（五）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和一般符号相比较，人类的语言也是一种符号。符号都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语言

符号的形式就是声音，语言符号的内容就是意义。语言是由许许多多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统一体——符号组成的系统。

语言符号的形式（音）和意义（义）的结合具有任意性，这一点和一般的符号一样，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1. 线条性。语言符号只能一个跟着一个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

2. 复杂性。可以说在现有人类使用的其他符号系统中，没有哪一种有人类语言那么复杂的。

3. 生成性。语言的符号是有限的，但是使用这一符号的人们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模式，生成出各种不同的句子来。语言符号的生成性可以这样来表示：成千的语素——成万的词——无穷的句子。

4. 体系性。有限的语言符号可以生成出无限的句子来，这说明语言符号不是互不相干、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有组织、有条理，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系统。

语言符号的体系性表现为：

第一，符号之间有层级关系。语言符号的最小单位是语素，能独立运用的是词，词可以构成词组和句子。语素和单音节词都是单个的符号，多音节词和词组、句子都是符号的系列。符号和符号系列可以分为若干层级：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

第二，符号之间有组合关系。语言的符号和符号可以组合，组合后表现出来的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比如：“我看”，主谓关系；“看我”述宾关系。符号和符号的组合就形成为语言的结构。

第三，符号之间有聚合关系。在语言符号的线性序列上，

有些符号可以互相替代，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例如：

我看书	我看书	我看书
他看书	我写书	我看报纸
你看书	我读书	我看电影

“我、你、他”“看、写、读”“书、报纸、电影”，每一组都可以互相替代，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可以聚合成为一类，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聚合关系使语言符号可以分类。

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成了语言符号的网，再加上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层级性，这一切，使语言成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言符号的形式，就是语音；语言符号作为一个音义结合体，就是词汇；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表现出来的各种关系，就是语法。因此，语音、词汇、语法被称为语言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又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合乎规律地共处在一个整体之中，表明了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

二 现代汉语

汉语，按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一) 现代汉语的形成。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汉语是汉族人的语言。汉人这个名称是在汉朝才出现的。但是，早在汉朝以前，汉民族就存在着。汉语也一样。现代

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共同语和方言、书面语和口语的分歧；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克服分歧、渐趋统一的长远过程。

从历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分封，群雄割据。在语言文字上，也一方面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当时王畿成周（今洛阳）一带方言为基础的书面共同语，即“雅言”。“雅言”之所以成为共同语，是出于交际的需要。据史书记载，周代设有翻译“外语”的专官。当时的“外语”，实际上指周以外的各国方言。专设的“翻译官”的任务，就是把各国的方言译为王畿成周一带的方言。史书还记载，孔子在读书、讲学和参加朝会典礼的时候，“操雅言不操方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以上材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就存在着共同语和方言的分歧以及要求统一于共同语的趋势。

秦统一中国以后，出现了“书同文”的局面。秦王朝废除了区域性的异体字——六国古文，推行经过李斯等人整理简化的秦国文字——小篆。“书同文”使语言的交际功能得以发挥，也促进了共同语的发展。

两汉时，一方面方言分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书面共同语的“通语”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汉成帝时，给事黄门郎、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扬雄，著有《方言》一书，对比了各地方言和“通语”的差异。这对“通语”的推广，起了很好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鲜卑等族统治中国北部，迫使部分汉族

人民南迁。这种状况，一方面加速了方言的分化，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北方话的使用范围，使北方话对中国南部各族人民发生了影响。

在历史上，汉族长期用“文言”作为统一的书面语。唐代以后，出现了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白话”。唐、五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都是用“白话”书写的。宋话本是伴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市民口头文学。市民口头文学的兴起和白话文学的广为流传，大大缩小了书面语和口语，共同语和方言的分歧。汉语发展到了它的近代阶段。

宋元以后，用“白话”写作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非常丰富，诞生了《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许多文学巨著。这些作品的语言，基本上属于北方话。它们流传到非北方话的区域，拥有广大的读者，促使非北方话地区的人们也读“白话”、写“白话”。它们无形中起了推广北方话的作用，为确立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共同语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白话文学作品的传播，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逐渐流行开；加以北京是元、明、清历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话是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被称为“官话”。文学影响和行政推行互相作用，使得北京话逐渐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到了五四时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一方面“白话文运动”彻底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白话文”取得了文学语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国语运动”又进一步促成了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话占据了民族共同语的宝座。于是，一种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都有统一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最后形成了。

解放以后，普通话迅速取得了在各方言区作为“通语”的主导地位，为我国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

(二) 现代汉语的影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语对兄弟民族，对友邻国家的语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高度统一和发展，随着现代汉语的更加丰富发展和精密化、规范化，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显著。

1. 汉语在我国各民族间的交际作用。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在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外，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在我国各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占94%，文化最发达，因此，汉语自然而然地成了各民族间的“通语”。不仅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在同汉族交际时使用汉语，而且少数民族之间交际时也使用汉语。除此之外，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彼此互相学习，各自从对方的语言中吸收有用的语言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语言，是古已有之。总之，汉语在我国各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共同协作、建设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2. 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秦汉以后，东方和西方各国跟中国往来日渐频繁。在交往中，一方面，汉语从世界许多语言中音译了不少词，另一方面，世界许多语言也从汉语里吸收了不少词。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在过去的许多年代里，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他们的语言也受到了汉语的巨大影响。

朝鲜谚文是在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创制的。谚文产生以前，最初是借用汉文、汉字。朝鲜制订了音素文字之后，很长时